多元现代性问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赵士发　李　燕

(1.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2. 武汉大学 珞珈学院, 武汉　430072)

摘　要: 多元现代性问题不是一个本体论问题,而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厘清本体论意义上的"一与多"的关系,以及方法论意义上的"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根据唯物史观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所选择的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它开创了一条新的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多元现代性实践之路,也开创了一种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中国模式。

关键词: 多元现代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普适价值

中图分类号: B 0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15)05-0018-07

多元现代性①如何可能与何以可能的问题,是一个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合法性与建设成败的问题。在理论上,国内外学术界对此问题也有诸多争论。在否定多元现代性方面,最为典型的观点是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他说:"如果我们现在还无法想象出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自己这个现实世界的世界,或者未来世界没有以一种明显的方式体现对当今秩序的彻底改善,我们就应该承认历史本身已经走到了尽头。"②这其实不过是西方中心论的最新形态。而在倡导多元现代性方面,引人关注的是以色列学者艾森斯塔德与华裔美籍学者杜维明等人所提出的东方现代性观念。但笔者认为,更值得学界重视的,是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所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他们从理论与实践上回答了多元现代性如何可能与何以可能的问题,这也代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关于多元现代性的理论。

一、多元现代性问题论争中的双重误区

综观学界对多元现代性问题的论争,其实存在着双重误区:一是在论争中将它作为一个本体论问题去看待,将多元现代性分解为本体论意义上的"一与多"的关系,从而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去看待东西方不同的现代性。二是在方法论上混淆了普遍规律与特殊道路的关系,将二者不加区别地等同起来。

首先,要区分多元现代性问题与本论体层面"一与多"问题的关系。本体论意义上的一与多涉及的是对世界终级本源的看法,即一元论与多元论。前者认为世界只有一个终极本源,而后者认为世界有多个终极本源,而且各个本源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从本体论的层面去讨论多元现代性问题,如果主张一元论,就会推论出西方或东方现代性是唯一的,从而否定多元现代性的存在与可能性,全盘西化论是其典型形态;如果主张多元论,就会推出西方与东方的现代性是根本不同的

收稿日期: 2015－05－20

作者简介: 赵士发,男,湖北江陵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ECT－13－0447)阶段性成果,受中央高校科研基本业务费资助。

① 关于多元现代性问题,学界有两种理解:一是认为现代性为复数,存在着不同的现代性,如东方与西方就有不同的现代性;二是认为现代性为单数,但实现现代性的道路有多种,多元现代性指的是不同的现代化道路或模式。本文在第二种意义上理解多元现代性一词。

②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7—58 页。

现代性,是彼此独立、互不相关的,结果就会导致各种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这样,多元现代性问题就变得神秘化与复杂化了,陷入一个难解的悖论之中。马克思曾经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①从实践角度考察,多元现代性并不是一个世界终极本源问题,它所指的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呈现出的不同道路。否定多元现代性的理论主张西方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唯一形态,西方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唯一道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历史终结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人类以后的历史将只是自由民主制度的普遍化。这是将现代性等同于西方化的典型看法。其哲学根据来自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本体论上则是以绝对精神为终极本源的一元论本体论。

其次,要区分普遍规律与特殊道路的关系。在关于多元现代性如何可能与何以可能问题的论争中,另一个重要误区是在方法论上混淆了普遍规律与特殊道路的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以前,历史发展有无普遍规律与何为历史发展规律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科学解答。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发展规律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发展规律决定的人类社会形态的辩证发展规律。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是以各民族具体的发展形式与发展道路表现出来的。马克思立足于唯物史观,通过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种规律性的揭示,而不是具体道路的描绘。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通过对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原理的发展,进一步揭示了普遍规律与特殊道路的辩证关系。因而他深刻指出:“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②就普遍规律与特殊道路的关系而言,普遍规律决定与支配特殊道路,特殊道路表现与反映普遍规律,但二者并不能画等号。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发展规律,揭示的是世界历史的普遍规律。这一规律对各民族的历史发展都起作用,但并不等于各民族都走同样的发展道路。马克思所言的几大社会形态,分别涉及了不同的民族国家,而不是指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必须依照顺序经历这几种社会形态。在马克思那里,普遍规律与特殊道路是区分开来了的。但遗憾的是,在不少人的头脑中,这一规律被理解为特殊道路,人们误以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是为各民族国家指定的发展道路,即每一个民族国家都必须依照顺序经历那几个社会形态。这就将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和民族历史发展的特殊道路混为一谈。

由上可见,以往学界关于现代性的论争存在着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双重误区。而产生这些误区的原因之一,则是意识形态的矛盾与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单一现代性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设置的一个意识形态陷阱。只有克服了以上关于多元现代性问题理解中的双重误区,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出发,才能走出这个陷阱,真正找到多元现代性确立的根据。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类社会从传统的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文明,走向以商品经济为主的现代工业文明的过程,就是现代化的过程。对这一过程,马克思进行了批判性与革命性的辩证理解。首先,马克思肯定了这个过程的历史必然性,肯定了资本主义在这个过程中起的巨大历史作用。但马克思并没有停留于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肯定性理解上,而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了辩证地理解。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和危机,以及它给人类带来的异化和苦难,着力探寻人类现代化的全新道路。特别是随着东方社会被卷入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洪流之中以后,落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问题引起了晚年马克思的深切关注。他甚至将《资本论》的写作暂时搁下,投身于对东方社会现代化问题的研究。马克思对东方社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0 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9 页。

会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当然是以其唯物史观为指导的,这是一种从后思索法。马克思看到了东方社会的特殊性,虽然东方社会的发展必须遵循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但马克思没有将现代性等同于西方化。在回答《祖国纪事》杂志社编辑的相关提问时,马克思颇为谨慎地指出,如果俄国能够利用世界历史条件下西方文明已经创造的条件,是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的。否则,就可能失去历史提供的最好机会,重新走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老路,而那无疑是一条野蛮而血腥的道路。马克思也区分了普遍规律与特殊道路的关系,没有将现代化与西方化等同起来,这就为探寻多元现代性的可能提供了方法论的根据。

二、多元现代性何以可能

在厘清了关于多元现代性问题理解上的双重误区以后,多元现代性何以可能的问题就当迎刃而解了。多元现代性何以可能?这可以从理论与实践的两个层面得到解答。

从理论上说,现代性理论是以进化论为根据的,而无论是生物进化论还是社会进化论,本身都承认遗传与变异的辩证关系,将进化本身看作一个复杂的多因素相互作用的扬弃过程。这就意味着,社会在进化过程中不可能是线性的与单一路径的。在生物与社会进化过程中,单一性将意味着活力的递减甚至死亡。多元现代性的必要性还可以从毛泽东关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原理中得到解答。现代性具有普遍性,它指的是不同民族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体现出的不同于传统与封建社会发展的共性与规律性。但现代性同时也具有特殊性,它本身即是矛盾的复合体,不同的民族社会都有自己的特殊矛盾,这体现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诸多层面的现代化中。现代性的实现即其所孕育矛盾的解决,不同的民族在解决现代性矛盾的过程中,只能根据自身的特殊情况去选择适当的路径。毛泽东正是在分析中国近代社会特殊矛盾的过程中,找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与苏联模式的现代化道路。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方社会理论,从理论上确证了多元现代性的必然性。

从实践层面来看,多元现代性的必要性问题也就是为什么一元现代性行不通的问题。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西方资本主义主导世界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已经日益暴露出了西方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危机与不可持续性,它在世界范围内的推进正逐步走向极限。马克思曾经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①但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正走向极限,资本主义现代性在世界范围内的推进正受到以下三个方面的限制:

一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限制。实现现代化本来是一个发展和解放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和方法,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都是现代化的重要方式。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这一限制决定了资本主义所孕育的生产力之大小。今天,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正日益接近其极限。特别是苏东剧变以来,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兴起,资本主义市场已经遍布全球,几乎饱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也随之扩展到全球范围。不少落后国家将现代化与西方化等同起来,根据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实现本国的现代化,结果并没有实现自己的发展和繁荣、自由和民主。相反,不少国家因此陷入了两极分化、政治动荡、文化扭曲的恶性循环。在卢旺达、印度尼西亚和前南斯拉夫地区,还导致了血腥剥夺和种族屠杀,始终没有出现人们所想象的普遍和平与繁荣景象。西方现代性在这些国家结出的种族主义和反对市场经济的恶果,充分表明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限度。这进而引起了理论界对发展中国家发展经验的反思与对发展理论的检讨,以及人们对西方现代性神话的怀疑和诘难。

二是人性与价值观的限制。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人性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特征,即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3 页。

自由自觉的活动或劳动。劳动的发展同样是一个辩证的有规律的过程。开始是人类的特殊劳动,即以生产使用价值为基础的劳动。在这种劳动形态下,劳动者与劳动资料是不可分离的,劳动分工主要是一种自然分工,人身依附关系是社会关系主要的内容。劳动者只能进行这种或那种特殊的劳动,如从事打猎还是从事耕种,都是由自然分工决定的。在这个阶段,劳动者主要生产满足自己需要的使用价值,不同的人们在劳动中体现出了自然经济时代主体人的原始的丰富性。随着特殊劳动的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劳动产品有了剩余,不同的劳动主体之间开始相互交换劳动产品,这就产生了物物交换。物品的不断丰富反过来激活了人的需要的丰富与多样化,人们的活动范围也不断扩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劳动工具的不断进步,劳动主体劳动能力的不断提高。物的交换不仅是劳动量的交换,而且是技术的交换。在交换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新的社会分工。随着交往的增加,市场经济得到了萌芽和发展,劳动者不再受限于以往的现成的劳动资料和劳动条件,劳动资料与劳动的逐步分离。劳动失去了过去那种由特殊的工具与条件,特殊的能力所界定的属性,劳动的目的也由主要生产使用价值变为主要生产交换价值。在抽象劳动的条件下,个人的自由和独立性有所增强,人类的需要和能力不断趋向全面化。但另一方面,由于劳动主体与劳动资料的分离,社会分工演变为一部分人提供劳动,一部分人提供劳动资料,提供劳动资料的人控制和奴役提供劳动的人,形成了工人与资本家。结果劳动抽象化导致了物对人的奴役,这就是所谓的异化劳动。对工人而言,劳动本身与劳动产品皆发生了异化,从而人的类本性、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都发生了异化。人性异化到极端便是人的工具化与非人化。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带来的人性危机。

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这就要谈谈人们争论不休的普适价值问题。在学界,支持普适价值说的人们,往往将西方的价值观看作是普适价值。实际上,就是在价值观上将西方现代性与现代性打上了等号。而否定普适价值观的人,则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普适价值。普适价值不过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民族国家进行和平演变与剥削压迫的意识形态陷阱,其主要目的是要其他国家认同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科学、理性等价值观念。以上两种看法,都是成问题的。倡导西方现代性的人实际上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作为一种普适价值进行推广,其背后确实隐藏着特殊的政治意图。这当然是我们要反对的。反对普适价值的人以此为由,否认存在着普适价值,实际上犯了将普遍性与特殊性割裂开来的错误。笔者认为,普适价值是客观存在的,根据在于人类的共性与共同利益;关于普适价值有无的争论,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但究竟什么样的价值才是普适价值,普适价值与多元现代性的关系等问题,则是值得讨论的真问题。首先,要明确普适价值的主体是人类。虽然人类目前还很难称为一个自觉的主体,但人类作为相对其他动物的存在者,却有着鲜明的共性和广泛的共同利益。共性方面如理性与自觉能动性、社会关系性、实践性与价值性;共同利益方面如需要共同面对各种生态环境问题与能源危机等,这从正反两个方面突显出人类的共同利益及人类主体的客观性。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倡导的所谓普适价值观念,其实并非抽象的价值观,而是承载着资产阶级利益的、非常具体的价值观。但资产阶级将其界定为普适价值,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使之抽象化了。国人在否定这些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同时,将普适价值观本身也否定了,这无异于倒洗澡水时将小孩也一并倒掉。所以问题不在于西方这些价值观念是抽象的或具体的,而在于它们所承载的利益的主体是谁。如果是全人类,那么,它们就是普适价值。否则,就只是一部分人的价值。而将部分等同于全体的错误在于割裂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虽然,资产阶级提出的这些价值观念,对反对封建主义还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资产阶级不可能突破自己狭隘的阶级利益。其次,应对这些价值观念赋予新的内涵,即将它们改造重塑为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价值观,即共产主义的价值观。作为普适价值的共产主义价值观,是在正确把握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与人的需要的基础上,科学提炼出来的价值观念。普适价值同样要通过具体的活动与形式表现出来。在现代化过程中,它通过不同的民族

国家的特殊制度与实践体现出来,各国的多元现代化实践与制度,并不否定普适价值的存在。

三是资源环境的限制。资本主义主导的西方现代化模式,是以工业化为核心的从传统到现代社会的转型。而西方工业化的兴起和发展,是以石油、天然气、煤炭为主要能源的。而这些资源,是有限的与不可再生的。西方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已经耗掉了百分之六十的能源资源。落后发展中国家如果走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老路,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将面临严重的危机。因此,当代世界落后国家实现自身的现代化,需要另辟蹊径;不仅在资源开发和使用上,而且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的理念上,都需要重新调整。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了西方现代化的问题,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主张建立生态文明与和谐世界,为多元现代性的实践开创了新的道路。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多元现代性实践

在讨论多元现代性问题时,人们大多会谈到以色列学者艾森斯塔德的观点。艾森斯塔特认为,“多元现代性”这一名词的最重要含义,是现代性不等于西化;现代性的西方模式不是唯一的“真正的”现代性,尽管现代性的西方模式享有历史上的优先地位,并且将继续作为其他现代性的一个基本参照点。“20 世纪末无可否认的趋势是,对现代性的理解、不同现代社会基本的文化议事日程日益走向多样化,这种多样化远远超出 20 世纪 50 年代的现代性的同质化图景和霸权图景。”①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全球化的浪潮风起云涌,资本主义现代性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展。特别是冷战结束后,西方将中国作为和变演变的对象,并明确地将和平演变成功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四代与第五代领导人身上。中国现代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国向何处去再度成为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中国传统的古今中西的论争再度成为热点,中国再次站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积极探索,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开创了多元现代性的中国模式,邓小平因而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在苏东剧变后,邓小平 1992 年南方谈话中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②邓小平区分了普遍规律与特殊道路,在承认普遍规律的前提下,看到道路的曲折和多样。他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开创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在实践上开创了实现多元现代性的新路。也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多元现代性的实践证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充分体现了普遍规律与特殊道路的有机统一。

首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内源型的现代化。虽然最早中国现代化是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中艰难起步的,但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现代化范式的根本转换。即由后发外源型现代化转为后发内源型现代化。其根本的特征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他反复强调:“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总

① 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年版,第 64—65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82—383 页。

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①在依靠自身的观点上,邓小平与毛泽东是一脉相承的。这确实是任何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中国现代化必须延续中国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它不仅决定着中国现代化的基本方向,而且决定着中国现代化的类型和模式,并为中国现代化提供内在的精神动力。因此,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必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得到总结和吸收。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本身就包容着一些现代性或有助于现代性的因素。它们对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具有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其二,中国现代性吸纳了西方现代性的优秀文明成果。自世界现代化的浪潮涌起以来,人类历史逐步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世界各民族国家与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依赖日益紧密,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随着交通通信手段的进步,交往的普遍性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个相互开放、相互交流与有机融合的整体。任何一个国家基于自身的历史传统与现代发展的优势而创造出的文明成果,都有可能为别的民族国家所借鉴和吸收,从而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邓小平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关于文明优势互补原理的科学运用。邓小平特别强调引进西方的民主精神与法治精神,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国家。

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创造了一种新型的现代性。现代性不等于西方化,现代性本身也不是独一无二的与凝固不变的,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它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西方现代性自近代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以来已经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著名学者施特劳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论述了从马基雅维利到卢梭、再到尼采的现代性的三次浪潮,并指出:“现代性最具特色的东西便是其多种多样以及其中的剧变频仍。其种类是如此之多,以至人们会怀疑可否把现代性当做某个统一的东西来谈论。”③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在传统基础上进行创新的过程。这一过程创造出了巨大的生产力,新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这是现代性最为值得肯定的地方。西方在创造现代性方面曾经并仍然还在做出自己的重要贡献,资本主义现代性对于推动世界其他地区的现代化发挥了巨大作用,时至今日仍然具有一定的优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是以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指导,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吸纳西方现代性的优秀文明成果,创造出一条新型的现代化之路。它为多元现代性的发展作出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贡献。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当今世界多元现代性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特别是中国开辟的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和形成的独特发展模式已经为反思现代性问题提供了重要参照系,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其中以下三个方面是最为重要的。

第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当然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实事求是”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邓小平坚持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有机统一起来,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上来,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1992 年春,邓小平在著名的南巡谈话中说:“马克思主义是打不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3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73 页。

③ 利奥·施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88 页。

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①邓小平在向国外领导人介绍中国经验时曾经说过,如果说中国有什么适用的经验,恐怕就是实事求是,这一经验普遍适用。

第二,坚持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的改革开放政策。任何一个国家的改革开放都不可能脱离整个世界,但当代世界体系中,资本主义占据着主导地位。国际上控制与反控制、压迫与反压迫的对立和斗争依然尖锐。改革开放虽然是实现优势互补的必然路径,但是,改革开放的政策路径在不同国家大异其趣,有的甚至南辕北辙。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的指导下,苏联实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推行政治多元化,很快就导致了苏联共产党的垮台和苏联的崩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顺应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客观规律,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提出的优势互补原理,进行稳中有进的改革和优势互补的全方位开放政策。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由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和外来干涉。

第三,坚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将普遍与特殊有机地统一起来。一方面,坚持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将其具体化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又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有机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主张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逐步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坚持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联系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经验与教训,还有许多方面。但以上三个方面的现代化经验,则是具有普遍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宝贵的经验教训,具有非凡的世界历史意义,它的成功将为世界其他民族与国家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并产生强烈的范导作用。

The Issueof Pluralistic Modernity and the Socialis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Zhao Shifa[1], Li Yan[2]

(1.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2. *Luojia School*,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issue of pluralistic modernity is not a problem of ontology, but a problem of methodology. In order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n what pluralistic modernity is, we need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nism and pluralism in ontolog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erality and particularity in the sense of methodology. The socialis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been chosen by the Chinese people in light of the law of social development revealed b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road of modernization. It has opened up a new way for the practice of pluralistic modernity,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mode of modernity, and it has also initiated the Chinese mod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Soviet socialist mode.

Key words: pluralistic modernity,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cialism, modernization, universal values

(责任编辑　　刘曙光)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82 页。